

月
河
漫
笔

战略时代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瞻前顾后

朱荣林 著

全球经济历史性地进入了
三大战略的时代
一体化经济战略、科教兴国战略
和可持续发展战略
这三大战略
为人类谋求发展既指明了方向
又提出了挑战

学林出版社

朱荣林
著

战略时代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的瞻前顾后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略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瞻前顾后/朱荣林著.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1

ISBN 7-80730-069-8

I. 战... II. 朱... III. ①经济发展-中国-文集
②社会发展-中国-文集 IV. ①F124-53②D66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8906 号

战略时代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瞻前顾后

作 者 朱荣林
责任编辑 林震浩
封面设计 周剑峰
责任监制 田振军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64515005 传真:64515005
发 行 学林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
电话:64515012 传真:64844088
照 排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5 1/16
印 张 21.75
字 数 33 万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6000 册
书 号 ISBN 7-80730-069-8/F·8
定 价 29.00 元



作者简介

朱荣林，浙江嘉兴人，1964—1969年上海交通大学求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上海发展研究所所长，国家发改委区域规划咨询专家，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导，上海市政府第二、三届决策咨询专家，上海市“十·五”、“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成员，上海市科协第六、七届常委，上海国际航运中心专家组专家，上海产业评估中心主任，上海市第十、十一、十二届人大代表。

曾先后赴美国乔治顿大学、美国国会技术评估局、美国华尔街金融中心、美国共和党战略问题研究中心、美国总商会、美国亿万富翁俱乐部（年会），英国牛津大学，日本国京都大学和庆应大学，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及意大利、中国香港等地讲学。著述有：《发展求索》、《高等教育管理学》、《跨国经营》、《走向长三角》、《现代经济理念》、《思路与判断力》、《成败萧何》等，并在国内外学术会议及各种报刊上发表过上百篇论文。

作为国际关系学者，曾应《国际先驱论坛报》主编达维·扬、戈尔巴乔夫（前苏联总统）、中曾根（日本前首相）、贝格（美国前国务卿）等国际社会著名人士和前政要的邀请出席国际论坛。

获中国省部级奖的成果有《上海社会发展指数评估体系研究》、《资产经营研究》等课题。曾应聘担任长江三峡开发总公司委托的《长江三峡工程管理模式研究》重大课题全国专家鉴定委员会主任。

序

坐落在千年古城嘉兴北翼的月河街区，迄今保存完好的 6 万平方米清末明初的建筑群，素墙黛瓦之间的历史沉淀，隐含着深邃的秀水文化。学术假期的写作间隙，我喜欢独坐日落黄昏的荷花堤，细心欣赏街区倒映在环城河之中的马头状墙影而陷于遐思。遐思之中不乏梦寐之想，虽然生理学上迄今对梦产生的机理缺乏完整的解释，但其共识是日有所思，则夜有所梦。换言之，梦的内容与人们清醒时保存的印象有关。人近暮年，中年、少年以至童年尚未实现的梦幻会不期而至，令你夜不能眠。正如伟大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Freud, Sigmund)所言：一种想法被意识界所压抑时，仍存在于潜意识界之中，并可成为隐藏的动机。这种动机里，我既有人类大同、刀枪入库之梦，也有资源循环、经济持续之梦，又有居者有其屋、劳者有其业之梦，更有期盼清风归己的“东篱南山”式陶渊明之梦。

我国一位资深学者曾有过一句洞察国情的话，令国人深省。他说，我们做不起美国的梦，不敢做日本的梦，也不能做印度的梦，只能做中国的梦。但是，我要补充的一句话是，这个“中国的梦”已经注定要在经济全球化这张大床上做。因为，我国已经成为 WTO 大家庭的成员。“月河漫笔”只是小小的笔谈而已，绝无暗喻北宋大家沈括“梦溪笔谈”26 卷巨著之望，也无借引李太白少时“梦笔生花”之意，只不过向读者道明作者的许多“中国的梦”是出自月河遐思罢了。

人类求索的过程也是梦幻之求实现的过程。从两者相互关系上分析，这本“月河漫笔”是《发展求索》的续编，在《发展求索》中我说过，全球经济历史性地进入了三大战略时代，为人类谋求发展既指明了方向，又提出了挑战。这三大战略分别为：一体化经济战略、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从人类认知世界的进程划分，公元前六世纪被称为

希腊哲学的第一阶段,此时哲学、宗教、科学三位一体,彼此从不同视角和方法去探知世界,人们的认识统一到“世界是一个整体”的观念之上。精神与物质分离的“二元论”的产生,是人格化的“上帝”被引入之后的结果。20 世纪初叶《相对论力学》和《量子力学》的诞生,动摇了经典物理学的基础,开始了一场人类认识史上的划时代革命,其影响所及远远超越了技术领域,在思想文化海洋里激起了巨大的涟漪。人们开始在各自领域里反思过去,从世界整体观和人类大同观展望未来美好的前景。南南合作、东西对话、和平共处、双赢互利,便是人们反思的产物。这种反思的轨迹,正在引导人们进入“时光隧道”,去重温人类先哲的理念。2010 年上海世博会,就是从 2 300 年之前古希腊哲学大师亚里士多德的著述里寻找主题词的。当今全球经济的一体化,既是经济客观运行的规律,也是人类从互争走向共荣之梦。各国政府争相入世的迫切之情,便是佐证。但是,成员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获取效益的多寡,将取决于自身的制度安排、经济效率和法制水平。从这个意义上判断,WTO 组织决不是经济效益的“保险箱”,而是资源配置的“竞技场”。这是本书的依据之一。

本书的依据之二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外向型经济成就的评估标准绝非是其规模,而是其质量;绝非是其产值,而是其附加值。而内在经济质量的提高,则有赖于科技和教育的振兴。全球 20 世纪初叶科技对经济的贡献率为 20%,50 年代为 40%,80 年代为 60%,21 世纪初为 80%左右。未来岁月里,科技将进一步改变历史:基因完成了排序;DNA 引入计算机开发(双螺旋结构储存信息量将是目前芯片的几百万倍);某种植物可望成为可再生能源而取代石油,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为繁荣科技前程,占领新世纪科技高地,各国纷纷加强教育立法,实行教育投资多元化,确保教育发展优先于科技进步,并不断使之走向全社会化、终身化和现代化,旨在确保“竞技场”上的强者地位。面对国际大势,我国应当完善科教战略,重构教育、技术、产业协调发展的统一平台,使经济发展建立在强有力的科教支持系统的基础之上。

本书的依据之三是,经济发展的决策必须建立在多样性的价值体系之上,实行多目标决策管理,坚持以人为本,走社会和谐、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之路,即可持续发展之路。我国经济发展长期以来奉行资源粗放型利用的增量模式,为此付出了惨痛的环境代价和高昂的社

会成本。我国资源的储备总量、储备结构、环境容量,已难以支撑这种以经济规模管理为主要目标,以粗放型增长为主导方式,以有形资源为配置重点的发展模式。我国的经济发展应当探求一种全新的、一体化的循环模式,使资源的生产效率最大化,最终构建起合理的生态经济模式,力争在不远的将来实现循环经济的基本要求,稳妥地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

本书收录的几十篇文稿,分列为七个部分,旨在从多角度去探索圆梦之路,以求正于社会贤达。

朱荣林

2005年8月于上海荣竹斋

目 录

序	1
---------	---

第一篇 21 世纪经济主旋律

城市发展模式与循环经济	2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	17
地球村面临的难题	27
天涯也可若毗邻	31
来之不易的初级阶段	58

第二篇 中国经济上了正道

经济高速增长喜与忧	64
走向新世纪的上海	79
浦东开发的 1 800 天	86
竞争力有指标吗	100
要在游泳中学会换气	104
北京的宾馆为何取消一次性用品	107
崇明岛应当做什么	110
产业发展路在何方	118
如何评估城市基础设施	123
科研项目正在关注资源循环利用	129

第三篇 策略思想改弦更张

体力动作之前的智力动作	134
策略视野识瓯城	145
梅里协调发展之梦	171
要从不同角度审视经济现象	177
附 中国新闻社稿	
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朱荣林破解长三角招商引资之困局	182

第四篇 经济国界在淡化

经济有了助推器	188
WTO 时代的科教兴国	191
蛇头咬蛇尾	198
申奥成功与国人未来	202
企业社会责任有了国际标准	204

第五篇 强化经济背景

人类进入了战略性时代	210
政府地位的历史性回归	218
未成年人应当怎样保护	225
科技立法应加强时效	228
认识论面临挑战	232
医疗制度安排的国际评估	240
和谐社会的时代视角	244
重新了解野生动物	247

第六篇 区域经济的呼唤

长三角经济正在走向一体化	254
--------------------	-----

京津冀都市圈构筑互动框架	268
世界都市圈在行动	272
长三角区域规划编制应注意的问题	278
城市群发展的关键在于功能建设	281

第七篇 文化遗产的传承

“田子坊”在改写旧城变迁史	292
一代宗师与故里教育	297
文化遗产为何要登录	301
一位采菊东篱下的艺术大师	305
数典寻祖忆旧踪	308
富春龙门写春秋	321
千年古城的家珍	324
有感于小南湖	328
“不对称”的陈逸飞	330
弃猫在等候“妈妈”	333

参考文献	336
------------	-----

后记	338
----------	-----

封面图片由潘伯才提供。

第一篇
21 世纪经济主旋律

城市发展模式与循环经济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
地球村面临的难题
天涯也可若毗邻
来之不易的初级阶段

城市发展模式与循环经济

我国经济几经波折,几度忧患,走上了持续、稳定、高速增长之路,令世人瞩目,也令国人为之振奋。但在感奋之余,我们必须冷静地评估这种增长模式及其内在质量。思考之一是勤俭建国之策是否已经过时?年轻一代似乎已将“勤俭”二字视作历史的词汇,认定“超前消费”、“负债消费”的时代已经叩响神州大门。但是,国人应当清醒地意识到,中国是一个处于经济起飞阶段的国家,在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双重推动之下成为一个经济快速增长的大国,但决非是一个经济强国。我国的人均财富,据专家评估只及日本国的 1/60,是美国的 3%,但他们的人口只及中国 1/6—1/7。思考之二是外贸出口的目标指向是创汇,还是创利?我国出口增长之快早已惊动四邻,在承受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同时,反倾销诉讼案件与日俱增,至 2004 年 5 月底已有 34 个国家和地区发起了 637 起涉及我国产品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及特保调查的案子。更值得思考的是,我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正在不断地向价值链的上游攀升,出口中已有 50% 属于加工贸易,不仅有损于我国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且其资本积累率极其低微,而其中 3/4 又是外资企业的功劳。在我国现行汇率制度之下每一笔外贸生意均会发生亏损,几乎进入了“高价进,低价出”的恶性循环之中。思考之三是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重重债务链如何清理?有专家从居安思危视角出发提出忠告:在评估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时要牢记两句话,即“人间没有不散的宴席”和“乐极生悲”。暗喻全球经济大萧条往往发生在经济繁荣的鼎盛时期,如 20 世纪 30 年代初叶的美国经济大萧条便是如此。这种忠告的背景,源自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高昂代价,即 12.3 万亿元的国内外债务链及其不可再生资源的短缺。

循环经济是 21 世纪全球经济运行的主旋律,其影响之甚远大于当

年知识经济的渲染,两者之间是一种互为响应的关系。认知循环经济应把握三个要点:一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以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为前提。有专家将可持续发展的资本概括为四个部分:①天然资本,指的是江河、山脉、土地、矿藏等;②人造资本,指的是公路、桥梁、机场、码头、厂房、电站等;③社会资本,指的是规范社会运行的法律、制度、体制、政策等;④人力资本,指的是训练有素的人才。可持续发展的“资本”不是传统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概念,它还包含了资源。要保持社会可持续发展,必须使这种“资本”在代际之间均衡配置,不可透支、不可超支。二是资源配置必须遵循比较优势的原则。同一要素和商品在全球不同的区位具有不同的价位,这就形成了比较优势。跨国公司之所以创造出占全世界 1/4 左右的产出,其基本方略是依据比较优势在全球范围“套利”,套利的过程是分解和重组生产流程,它降低了资源配置成本,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这应当成为我国国内企业配置资源的楷模。循环经济的重要衡量标准之一是资源生产率,根据比较优势原则配置资源是提高资源生产率的重要途径。三是人类需求的无限性必须理智地服从资源的稀缺性。市场经济模式和手段周旋于需求无限性与资源稀缺性之间,旨在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原理向资源稀缺性“宣战”,其结果必然导致“地球村”生存的危机四伏。曾几何时,以“10 年功夫走完西方工业国家用半个世纪才能走完其历程”而骄傲的国人,现在则深深哀叹发展“后继乏力”。我国深圳市创造了“深圳速度”而令国人感奋,起步时用了 18 年时间使 GDP 突破 1 000 亿元大关,当 GDP 从 1 000 亿元增长至 2 000 亿元时仅用了 5 年时间,而当 GDP 从 2 000 亿元增长至 3 000 亿元时只用了 2 年时间。殊不知,这种惊人的速度纯粹以透支可持续发展资本为其代价的。深圳市的决策者现已深切感受到,经济总量再要上一个台阶,面临的将是土地空间、水资源、能源、环境容量和人力资本这 5 大条件的严重制约。这里可以用一语描述:今天人类的痛苦,是昨天人类错误决策的结果;而今天人类的错误决策,必将加剧明天人类的痛苦。

本文以上海为例,从城市发展模式转换的角度思考循环经济。

第一,城市发展模式转换的内涵和背景

上海城市发展模式转换的内涵有四个方面:内涵之一是资源配置

方式的转换。资源配置方式转换是一个老命题,问题在于人们必须关注其两个层面,缺一不可。一方面,我们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努力建立一个有效市场,降低企业进退市场的成本,提高市场的对称性,强化市场运作的法律秩序。但是,另一方面还应保证公共资源的配置走向公共选择。我国第一轮公共资源大规模配置是 20 世纪 80 年代初叶的神州广袤农村的土地承包,由于她基本上是由农民自发创造的一种公平的分配模式,使之符合了公共选择的原则,因而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其稳定性可从各地信访内容分布结构中得知。相对而言,起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国企改革,下岗工人的强烈反响与农民对土地使用权分配的认同态度形成鲜明的对照。其源盖出于国有资产的处置背离了公共选择的原则,它是由管理层少数成员在工人退出企业之后进行“收购”。香港大学郎咸平教授提出尖锐批评的依据便在于此。面对这种批评,我国主流经济学派苍白无力的应对,显示了我国社会正在重新评估这一学派的生命力。当社会群体的大多数和几乎整个法学界,在关键时刻并没有站在社会主流经济学派这一边,其根源肯定不在于前者,而在于后者。

内涵之二是城市功能地位的变化。20 世纪 90 年代初叶中央政府提出开发开放上海浦东,并将上海功能目标设定为国际经济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之后,上海的城市功能已经从一个传统的制造加工功能地位踏上了现代服务功能地位的征途。据此定位,上海已经从昔日的存量中心的经济地位走向流量中心的经济地位,“国际中心”的定位(后又加上国际航运中心的定位),除国际经济中心涵盖了不同功能的经济形态之外,贸易中心、金融中心、航运中心以及与此同步的“三港”建设,均属于流量中心建设的标志,它包容了技术流、信息流、金融流、货物流和服务流。流量中心的功能地位使上海整体效益的获取从“坐商”为主,走向“行商”为主。从这一经济逻辑出发,上海“服务全国”的动机已经从“发扬风格”为主走向“寻求生存与发展”为主,与此同时,服务主体、服务方式、服务内容和服务对象均相应地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使上海的经济的发展将从以消耗有形要素为主的制造业为主导产业,走向以消耗无形要素为主的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导产业,要素地位的变化将使上海的资源配置更加符合比较优势的原则。

内涵之三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由于我国老龄化社会的进程对

高储蓄率的影响、WTO 的承诺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资金供应垄断地位的改变,以及外汇流出管制的弱化趋势,将导致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从要素投入推动走向创新推动。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逐步改变,必将深刻地影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使之逐步从增量模式走向效益模式。模式的转变,使上海的要素结构与生产结构渐趋吻合,即推动无形要素相对地位的上升和有形要素相对地位的下降,进而提高了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但是,这里还需处理好一个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关系,既要防止劳动排斥技术,也要防止技术排斥劳动。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曾断言,早在英国工业革命 400 年之前的中国已经具备了发生世界工业革命的条件。世界工业革命之所以没有发生在 400 年之前这个曾经最早孕育过资本主义萌芽的中国,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人地矛盾的资源结构特征决定了在中国不需要发明一种“节约劳动的技术”。这种劳动排斥技术的现象至今还在我国存在,当知识经济时代来临后,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将无情地把技术要素推上经济增长主要动力的“宝座”。届时,技术与劳动的关系将面临新的调整,这种调整的重要手段将是国民教育。

内涵之四是政府职能和行政方式的转变。18 世纪法国著名思想家卢梭说过,国家是“自由”的公民“自由协议”的产物,人们同意将自己的权力转让给国家,国家必须保护一切缔约者的自由、平等、生命和财产,以体现公民的“公意”。为保护缔约者的权益,必然要求有一个中介体沟通主权者(国家)和全体缔约者(人民),这个中介体就是政府。在漫长的岁月里,这个行使国家事务管理权的中介体(政府)全权行使管理社会事务的权力,一切缔约者均成为行政管理的客体,许多领域里还发生了公民被侵权的行为,甚至颠倒了国家与社会的位置关系。20 世纪 20 年代,政府权力的稳定性和有效性达到了极其规范的程度,最终产生了官僚模式的政府,形成了“只有民主政府,没有民主行政”的权力结构,导致行政低效和贪污腐败,离间了政府与社会之间相互的信任关系。我国对公共权力结构重建的探索,几乎与全球性行政改革浪潮起步于同一时期。在 20 世纪 70 年代兴起的《新公共管理学》猛烈抨击政府行政行为和公共权力结构不久,我国便步入了以“放权、让利”为先导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

马斯格雷夫将政府财政职能归结为三条:一是资源配置职能,政府

通过提供公共产品,满足公共需要,以利于提高政府的社会管理和统治能力;二是收入分配职能,政府运用税收、转移支付、社会保障等手段以调节社会分配;三是稳定经济职能,政府运用宏观经济政策,诸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来烫平经济波动,以保持经济稳定、持续、健康地发展。根据这一判断,我国政府的职能应当实现三大转变,即从全能型管理走向有限型管理,从经济职能走向公共职能,从支配地位走向服务地位。政府行政方式也要相应地实现三大转变,即从传统行政走向法律行政,从暗箱行政走向透明行政,从低成本行政走向低成本行政。

上海城市发展模式转换的背景有三:背景之一是产业背景。从 18 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发生了两次经济革命,第一次是工业革命。这次革命导致全球资源不断地从传统的农业领域走向工业领域。第二次是服务业革命。它使全球资源从工业领域逐步流向服务业领域,这次革命又由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而加大了其扩散性。经济全球化导致发达国家扩散效应系数放大,进而促使次发达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发生前倾,出现了“非工业化”现象,使服务业不断地从工业体系中分离出来,走上独立的产业之路。长期以来,服务业在古典经济学传统理论之中被认知为“非生产性”的行业,因而是一种缺失交换能力的劳动。当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为“服务”正名之后,人们才认识到它是一种不可储存的、非实物的无形商品,其劳动不是体现在物与货币之间,而是体现在劳动与货币之间的交换。服务产品需求收入弹性之高,将导致资源在收入增加时流向服务业。第二次经济革命在发达国家尤为彻底,就业人员正处于大量地向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转移的过程之中。据统计,1991 年至 1999 年近 10 年中,美国纽约制造业净减少了 166 600 个工作岗位,服务业却增加了 603 900 个工作岗位,贸易部门增加了 103 200 个工作岗位。2000 年纽约服务业就业比重占 51%,零售批发业占 14%,金融房地产业占 9%。至 2001 年纽约全市 90%的就业人员从事第三产业。现代服务业的崛起并成为主导产业已成不可抗拒之势,截止 2000 年,服务业占 GDP 比重,世界平均水平为 62%,其中 22 个高收入国家为 65%,48 个中等收入国家为 52%,34 个低收入国家为 43.5%,而我国仅为 40%,其不小的差距正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巨大空间。

背景之二是资源背景。发达国家先后凭藉其军事优势、外交优势

和资源配置手段的优势,使其占全球不足 15% 的人口,耗用了全球 60% 的能源和 50% 的矿产资源,从而走完了工业化的历程。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发达国家又平添了三种机遇:①宏观层面上世界各国制度逐步趋同,从计划模式走向了市场模式,淡化了要素流动的物理性边界。在要素流动的规律指向引导下,资源不断地从配置水平低的地区流向配置水平高的地区,即成熟的市场化地区。②微观层面上 WTO 统一了全球贸易的游戏规则,扩大了发达国家资源配置的领地。③技术角度上因特网降低了企业所有权的控制成本和交易费用,进而放大了跨国公司的活动半径,有利于其遵循比较优势配置资源的原则,加快了生产流程的分解与重组,实现了全球套利。与之相对应,另有 85% 以上人口的国家正在先后步入工业化发展阶段,其步履必然会遇到资源短缺的严重制约。由此可以断言,我国工业化进程成功的惟一指望是提高资源生产率,舍此别无他途。

背景之三是市场化背景。世上事物的发展绝对的“好”与绝对的“坏”是不存在的。市场经济能解决效率,但无法解决公平;能解决惰性,但不能解决诚信。市场经济以新古典经济学基本原理为其支撑系统,简洁、抽象的数学关系替代了极其复杂的人际情感关系。其结果必然以牺牲人与人之间关系、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和人与未来之间关系为代价,去满足人类需求无节制的增长。这种被称之为“边际道德”的行为准则与科学发展观的“五大统筹”相背离,它从另一个层面激发了发展循环经济的紧迫性。

第二,城市发展模式转换的功能基础和经济逻辑

首先,我国经济增长空间布局结构的演化推动着上海功能地位的变化。神州五号遥拍我国大陆的夜景照片引起经济学界的莫大兴趣,人们发现祖国东南沿海灯光密集,尤以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为最,及至中部地区则灯光显得逊色许多,至于西部地区则基本上暗淡无光。这一景观对比,标明了我国经济增长空间布局结构从沿海向内陆的递度分布走势。以长三角地区为例,这种走势的规律指向有四:①区位优势指向。工业经济是一种交易经济,效益在交易过程中发生。海上贸易的交易成本显然与商品产地靠海距离直接相关,因此生产基地的向沿海集聚是其必然趋势。一个地区的对外开放系数由海岸线长度与国